

# 写作掌故杂谈

潘述羊

**编者按：**《写作掌故杂谈》系作者为中文系写作课编写的补充教材。该书谈论文学史上的掌故，分析脍炙人口的诗文，以科学性和趣味性相结合论述有关的文艺现象和写作知识，宜作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参考，也可作为爱好文艺的青年的进修读物。

全书分为总论、审题标题、立意选材、组织结构、遣词造句、润饰修改、缩写改写、八股文等八个部份，共六十八篇。这里刊载的选自总论。今后，将从其它各个部份陆续选摘发表。

## 虚心学习

有这样一个故事：明代苏州地方一个人名叫沈野之，极不虚心，不论写文章或者作诗，竟先自圈点，然后才落稿。著名文学家曹学佺曾嘲笑他：“半夜号跳常索酒，一生鼾鼾自圈诗。”（阮葵生：《茶余客话》）世间如沈野之那样的人还是不少的。

古人说：“学然后知不足”，凡是知足自满者大抵都是不爱学习的人，也无怪这种人夜郎自大了。《随园诗话》曾引证过两位诗人的句子：一是鄂容安，他在题甘露寺一诗中说：“到此已穷千里目，谁知才上一层楼。”另一是方子云，他在《偶成》中说：“目中自谓空千古，海外谁知有九州？”他们的话，鼓励人们虚心学习，很发人深省。

虚心学习，应不限于学习书本知识。我国科技史上很有名的著作《梦溪笔谈》的作者沈括就很注意向人民学习。他积极投身到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去，主持过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，兼管过军器监。他的官是很大的，但他时时处处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，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是他调查请教的对象。因此，才有可能在《梦溪笔谈》中以大量的篇幅总结了我国古代科技方面的卓越贡献。

搞创作、写文章虽不完全同于写科学著作，但同样要虚心向群众学习，深入生活，调查研究才行。杜甫说：“转益多师是汝师。”意思是要向各方面学习。《随园诗话》的作者袁子才还说过：“村童牧竖，一言一笑，皆吾之师。”从他们那里，如果善于选择，也能得到写作中的警句。袁子才的大庄园——随园里有一个担粪的工人，十月中在梅树下向他报告说：“梅树已有一身花矣！”袁子才受到启发，立

刻写了两句诗：“月映竹成千个字，霜高梅孕一身花。”又一次，二月间他离家外出，一个和尚给他送行。和尚道：“可惜园中梅花盛开，我公却带不去。”袁子才因而得句云：“只怜香雪梅千树，不得随身带上船。”

## 多读多写

多读多写应是古往今来著名作家取得成就的经验之谈。北宋欧阳修曾说：“文有三多：看多，做多，商量多也。”（见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）所谓看多，包括看别人写的文章和揣摩别人修改的稿子。《曲洧旧闻》载“黄鲁直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，归而熟视之，自是文章日进。此无他，见其牵易字句与初造意时不同，而识其用意之浅深也。”所谓做多，就是要勤于写作。所谓商量多，指的是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研究。《论语·宪问》上已经有写文章要经过讨论的说法。这道理委实简单，因为“凡人为文，私于自是，不忍于割截，或失于繁多，其间妍媸益又自惑，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，讨论而削夺之，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。”（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）唐代的李白与杜甫就是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杜甫《春日忆李白》：“何时一樽酒，重与细论文！”那情景是多么令人艳羡。他们一起讨论的，自然既有别人的作品，也有自己的文章。

关于欧阳修谈写作经验，还有一则与上面相类似的记载：

项岁，孙莘老识文忠公，乘间以文字问之。云：无他术，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。世人患作文字少，又懒读书；每出一篇，即求过人，如此少有至者。疵病不必待人指摘，多作自能见之。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，故尤有味。（《诗

此外，苏辙在回答“学文如何”这个问题时，也说：“前辈但看多、做多而已。”（苏辙《乘城遗言》）南宋词人姜夔总结写作经验为八个字：“多看自知，多作自好。”（《白石诗说》七则）鲁迅在改赖少麒的信中写道：“文章应该怎样做，我说不出来，因为自己的作文，是由于多看和练习，此外并无心得和方法的。”象这样的经验之谈，在我国历代的文论著作中真是不胜枚举。

至于实践“勤读多为”这一经验，在中国文学史上素以多产闻名的作家，可以举出梅尧臣和陆放翁两人为代表。

曾经说过“状难写之景，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，见于言外”的梅尧臣，字圣俞，是北宋大诗人。“君溪渔隐曰：旧说梅圣俞，日课一诗，寒暑未尝易也，圣俞诗名满世，盖身试此说（按：指‘勤读多为’）之效耳。”（《诗人玉屑》卷五“勤读多为”）

南宋爱国诗人陆游，一生写诗万余首，古来作诗之多，没有人超过他，稍晚于陆游的刘克庄曾经讲述一段故事，他说：“昔梅圣俞日课一诗。余为方孚若作行状，其家以陆放翁手录诗稿一卷作为润笔，题其前云：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，计七十八日，得诗一百首。陆之日课尤勤于梅。二公岂贪多哉！艺之熟者必精，理势然也。”（《诗人玉屑》卷五“艺熟必精”）

## 生活与作文

由于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五彩缤纷的画廊中，批评家们历来不重视小说与戏剧的地位，因而关于生活与创作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方面的探讨，比较地显得有些薄弱。

但，这个问题古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论述的。陆机的《文赋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。他一开头就谈到“佇中区以玄览”。佇，久立；中区，犹区中，谓宇宙之中；玄览，就是深刻的观察。这一句的意思是说：从生活中观察万物，才能引起文思。接着陆机又说：“遵四时以叹逝，瞻万物而思纷；悲落叶于劲秋，喜柔条于芳春。”这就进一步分析了生活于四季变迁、万物盛衰的客观世界中，意识、感情来源于物质，文学创作植根于生活的道理。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与杜甫，伟大散文家韩愈与柳宗元都是由于深入生活实践，再加上其它的条件，才成就为一代宗匠的。

关于这一点，汉代伟大的散文家司马迁的生活经历最能说明问题：

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有广博学问修养的知识分子家庭。年轻时候“耕牧河山之阳”，从事过农业劳动。后来又向经家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《春秋》，向孔安国学习古文《尚书》。二十岁那年开始了漫游生活：“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于沅湘。北涉汶泗，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峄，厄困郾薛彭城，过梁楚

以归”。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归后，仕为郎中，又“奉使西征巴蜀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”。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、封禅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。他在旅行中非常注意调查研究，采访遗闻佚事。“例如，他初到淮阴的时候，听到人家说：韩信微时，志不在小，当他母亲死了，虽无以为葬，却不顾一切营求到墓旁可住万家的葬地。司马迁便亲自去参观了韩信母亲的坟墓，而后信其言之不虛。”他“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，更深入了解了汉初史迹的宝库，刘邦、肖何、曹参、周勃、卢绾、樊噲、夏侯婴（滕公）、周昌、周继都出生在这一地区，给予他博访周咨的机会。他从采访汉高祖在乡间好酒色的故事以外，还对这人屠狗卖缢的生活，作了仔细的调查，并且参观了肖何、曹参、樊噲、滕公的葬址，后来他整理游历时期的所见所闻，都写入了自己的著作。”（张舜徽《中国古代史籍举要》）所有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，也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与眼界，特别是他替李陵兵败匈奴一事辩护，触怒了武帝，下蚕室受腐刑，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耻辱，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了深入的理解与认识，这才继续发愤著书，“成一家之言”。（《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）

宋朝时候有人为此总结说：“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览四海名山大川，与燕赵间豪俊交游，故其文疏荡，颇有奇气。”（苏辙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）这个说法虽不全面，但生活与作文之间的关系还是鲜明表示出来了的。

文学的兴会与灵感，文学的内容与实质，主要来源应当是生活。除了生活之外无所谓文学作品。宋代的苏轼在为《江行唱和集》写的序文中指出：“山川之秀美，风俗之朴陋，贤人君子之遗迹，与凡耳目之所接者，杂然有触于中，而发于咏叹！”陆游在《题庐陵肖彦毓秀才诗卷后》也指出：“君诗妙处吾能识，正在山程水驿中。”

不过，我们强调生活并不是强调必须远游。远游诚然可以丰富生活，但丰富的生活并非只能来源于远游的。这里可以举出唐代大诗人李贺为例证。李贺字长吉，福昌（今河南宜阳西）人。他是李唐王室的远支，家世早已没落，生活困顿。一生只活了二十七岁。他足迹所到之处是不远的。

所与游者，王参元、杨敬之、权璩、崔植辈为密。每旦日出与诸公游，未尝得题然后为诗，如他人思量率合以及程限为意。恒从小奚奴，骑距驴，背一古破锦囊，遇有所得，即书投囊中。及暮归，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，见所书多，辄曰：“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！”上灯，与食，长吉从婢取书，研墨叠纸足成之，投他囊中。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，过亦不复省。王、杨辈时复来探取去。（李商隐《李长吉小传》）

李贺骑驴觅诗的故事，《新唐书》作“骑弱马”，大约唐人是很喜欢这种在短足旅行中吟诗的。白居易就曾回忆

他同元稹一道，有一年的春天游城南时，两人“马上相戏，因各诵新艳小律，不杂他篇，自皇子陂归昭国里，迭吟递唱，不绝声者二十里余。”（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）难怪陆游在谈到作诗时要说，“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”，并且希望他的朋友“愿舟楫鞍马间。加意勿辍，他日绝尘迈往之作，必得之此时为多。”（见《广西通志》卷二二四载桂林石刻《陆游与杜思恭手札》）

至于象李贺那样外出觅诗的，宋代还可以举出李清照。这位女词人号易安居士，丈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学者，“明诚在建康日，易安每值天大雪，即顶笠披蓑，循城远览以寻诗，得句必邀其夫赓和，明诚每苦之也。”（周焯《清溪杂志》）

最后要补充说明一点：生活的内含是丰富多彩的，但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的生活。

## “读书破万卷”

杜甫三十七岁那年，在长安曾作《赠韦左丞文（济）二十二韵》，其中自述学习写作的经验谓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这个说法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。

据说有人问王安石：“老杜诗何故妙绝古今？”王安石答道：“老杜固尝言之，‘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’。”（《诗人玉屑》卷十四）

至于何以读书多了就能把文章写好，元代有人曾经打过一个并不十分贴切、但却有趣味的譬喻。

读书如铸铜：聚铜入炉。火鞴扇之，不消不止，极用费力。作文如铸器：铜既销矣，随铸铸器，一治即成，只要识模，全不费力。所谓勤于读书，逸于作文者此也。（程端礼《读书分年日程》）

严羽在谈到诗歌创作时也说：

“夫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；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然非多读书、多穷理，则不能极其至。”（《沧浪诗话》）

《随园诗话》曾经记了一段有趣的争论。据说苏东坡批评唐代诗人孟浩然，认为他的诗不是不佳，只可惜“作料”少。清初诗人施愚山不同意苏东坡的看法，反嘲道：苏东坡的诗不是不佳，只可惜“作料”多。施愚山觉得，诗如人的眼睛，一道灵光，眼珠里是容不得金属的；作料之类的东西怎能在诗中去找寻呢？但也许有人会追问说：“诗既然不费用典故，何以杜甫有读书破万卷的说法？”袁子才回答是这样的：人们不懂得“破”与“有神”三字，全是教人读书作文的方法。“盖破其卷取其神，非囿囿用其糟粕也。蚕食桑而所吐者丝，非桑也。蜂采花而所酿者蜜，非花也。”

郭沫若在《读〈随园诗话〉札记》里高度评价了袁子才的意见，并为扩充其意，而成六言八句：

蚕食桑而吐丝，蜂采花而酿蜜。

牛吃草而出奶，树吸壤而生漆。

破其卷而取神，吮其精而去粕。

融宇宙之万有，凭呕心之创作。

郭沫若的这首六言诗当然算写得好的。它充分肯定了读书对于写作的重要性，而且表达得如此形象生动。只可惜全诗过分拘泥于袁子才的说法，把书籍当作写作的原料，强调去粗取精，而忽略了读书能使人聪明，增人才干这个极其重要之点。诗的最后两句虽然也可以解释为创作当以“宇宙之万有”作为源泉，但紧接着蚕食桑、蜂采花、牛吃草、树吸壤、人读书等五个譬喻之后，这里的“宇宙之万有”显然就不是一般所理解的、作为文学艺术的源泉的“生活”了。

## 得物态，穷物理

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云：“积学以储宝，酌理以富才，研阅以穷照，驯致以绎辞。”这四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要写好文章，必须努力学习以积累知识，必须对事理进行分析以丰富自己的才能，必须广泛地寻根究底地观察分析研究客观物象，并在构思的过程中逐渐选择适当的词藻。关于读书明理的问题，在《读书破万卷》一文中已略有阐述，这里只想谈谈“研阅以穷照”和“驯致以绎辞”。

比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早生大约两百年的陆机，在谈到自己写文章的困难时，曾经总结为：“恒患意不称物，文不逮意。”（《文赋》）所谓意不称物，就是指构思之意，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，即苏轼讲的“观物之妙，不能了然于心”。所谓文不逮意，指的是写出之文，与构思之意尚有距离，即苏轼讲的“了然于心，不能了然于口与手”（见《答谢民师书》）。要解决这个困难，只有全力以赴的去“研阅以穷照”和“驯致以绎辞。”

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王夫之，在《姜斋诗话》卷一里，举文学作品的具体描写作例，形象地论证了怎样才能既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与手这个大问题。他的讲法非常别致有趣。

王夫之先以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为证。这篇诗写的是一个女子与“士”结婚以至被遗弃的经过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间的不平等。诗中有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”两句，译成白话文为：桑树未落叶的时候，桑叶润泽。用以比喻诗中的女主人公年轻时的健美。苏轼认为“体物之工，非‘沃若’不足以言桑；非桑不足以当‘沃若’。”王夫之同意苏轼的评价。《氓》的作者，对事物的观察和描写是准确的。但是王夫之又进一步指出，上例对事物观察与反映，“得物态，未得物理。”接着他仍以《诗经》为例。《周南·桃夭》是一篇祝贺女子出嫁的作品，其中有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；“桃之夭夭，有萋有实”和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”三句。王夫之说：这里不但“得物态”，而且“穷

物理”。因为桃树唯有正当盛年，婀娜妍茂，即所谓“天天”，才是花荣、叶盛、实著的，等到桃树长至拱把以上，则“液流蠹结，花不荣，叶不盛，实不著”了。诗人用“天天”桃树比喻出嫁的少女，暗示其婚后的幸福生活，那是再贴切不过的了。

## 文实与言行

一个人写文章必须实事求是：写的东西要同实际情况一致，写出来的要同所作所为一致。文实不符，言行相背，乃是写作的最大敌人。

先谈文与实的问题。有一则笑话，李廷彦热中于功名富贵，写了诗献给一位达官贵人。他的诗中有这样两句：“舍弟江南没，家兄塞北亡。”这位达官贵人顿时起了同情之心，十分悲伤地说：“没有想到你家里一连遭到两件凶祸！”李廷彦大约感觉到让这位贵人如此悲伤颇有些不妙，于是即忙据实申明，说：“两件凶祸都非事实，不过贪图诗中対偶的句子工整，夸大自己的可怜而已。”

“诗人之言不足有实”，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，如果认为是规律，却是一条可怕的规律。唐代宣宗时，有一次令狐宰相向皇帝推荐李远担任杭州太守。宣宗说：“我听说李远有句诗云：长日唯销一局棋。成天下棋的人怎么可以放心让他去管理州郡呢？”令狐宰相回答到：“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。”（张固《幽闲鼓吹》）尽管后来令狐宰相多方面为李远辩解，而后来李远也确有才干和政绩，但无论如何这种人的可信性还是值得怀疑的。

清代大诗人王士禛，号阮亭，官至刑部尚书。他在世的时候就有盛名，人称一代宗师。他的一部《渔洋诗话》很有些疏于考证的地方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和《鲁斋集》均曾给予纠正，王士禛也可算是文不顾实的典型。

赵秋谷云：“阮亭昔以少詹祭南海，留别都门诸子云：‘庐沟桥上望，落日风尘昏。万里自兹始，孤怀谁与论。’又曰：‘此去珠江水，相思寄断猿。’不知滴宦迁客更作何语！又曰：‘寒宵共杯酒，一笑失穷途。’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？”秋谷与阮亭为难，然此论实切其弊，学子所当引为戒者。按阮亭典故蜀中，别郑水部云：“与君俱绝域，此别各魂消。”又天门山夜泊云：“胜游非梦到，绝域此生还。”正与前同病。但求措语工妙，不顾心之所不安。（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卷十一）

后人曾经把他同桐城派的祖师爷方望溪一起加以嘲笑：一代宗师才力薄，望溪文集阮亭诗。这不是偶然的。

其次，谈言与行的问题，下面的例子很有意思：

汉高祖刘邦在《大风歌》中说：“安得猛士兮，守四方。”可是后来却杀戮功臣。

魏武帝曹操在《对酒歌》中说：“老耄皆得以寿终，

恩泽广及草木昆虫。”可是，他却坑流民四十余万。

张华《励志诗》说：“甘心恬适，栖志浮云。”最终，竟以贪位被杀。

隋炀帝《景阳井铭》：“前车已覆，后乘将没。”而淫乱尤甚于陈代。

唐玄宗《过宁王宅》诗曰：“复寻为善乐，方验保山河。”但，天宝年间由于他的荒乱，导致宗庙播迁。

李林甫《赠韩席侍郎》诗曰：“揆予秉孤直，虚薄忝文昌。”可是，这位奸臣却日怀险诈，蠹害朝政。（转引自谢榛《四溟诗话》卷一）

不需多引证，已经令人毛骨悚然了。在经受了十年大灾难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内乱之后，人们对这种言行相背的人和事，感受是特别深刻的。

## 一字师

“一字师”，说的是改正一个字的老师。作者能够接受意见，对改正一个字的人，尊为老师，当然是虚心学习的表现。曹子建曾经说：

世人著述，不能无病。仆常好人讥弹其文，有不善应时改定。昔丁敬礼尝作小文，使仆润饰之，仆自以才不过若人，辞不为也。敬礼谓仆：“卿何所疑难。文之佳恶，吾自得之，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？”吾常叹此达言，以为美谈。（《与杨德祖书》）

曹子建的上述意见当然是有道理的，但是丁敬礼的那段客气话，却引起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批评：

文辞非古人所重，草创讨论，修饰润色，固已合众力而为辞矣。期于尽善，不期于矜私也。丁敬礼使曹子建润色其文，以谓后世谁知定吾文者，是有意于欺世也。存其文而兼存与定之善否，是使后世法一人之文而获两善之益焉，所补岂不大乎？（《文史通义·说林》）

文学史上留给我们的一字之师的故事，正是既存原稿，又存改正后的清稿，使我们能够从中“获两善之益”的。

我国古籍中关于一字师的记载相当多。如：唐李相（见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切磋）、宋杨万里（见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十三）并称小吏为一字师；唐李频称方干（见陈京《葆化录》）、僧齐己称郑谷（见《五代史补》）、宋曾吉父称韩子苍（见《竹坡诗话》三）、张咏称萧楚才（见戴埴《鼠璞》）、元萨天锡称山东叟（见施闰章《蠹斋诗话》）等。其中唐李相读《春秋》，读了错别字；宋杨万里以于宝当干宝，认了错别字，这两个故事跟写作中比较两种不同的写法，从而提高欣赏能力，改进写作，关系似乎不太大。此处且举出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。

元萨天锡诗：“地湿厌闻天竺雨，月明来听景阳钟。”脍炙于时。山东一吏鄙之，萨往

问故。曰：“此联固善，‘闻’、‘听’二字一合耳。”萨问：“当易以何字？”叟徐曰：“看天竺雨。”萨疑看字所出，叟曰：“唐人有关‘林下老僧来看雨’。”萨俯首，拜为一字师。（施闰章《蠹斋诗话》）

这位山东叟的意见是正确的。雨只可看，无法闻。古人诗中虽也有“听雨”的说法，不过那是写雨声。所以“闻雨”实际上属于动宾不相应。

肖楚才知溧阳县，张乖崖作牧，一日召食，见公几案有一绝云：“独恨太平无一事，江南闲杀老尚书。”肖改“恨”作“幸”字。公出，视稿曰：“谁改吾诗？”左右以实对。肖曰：“与公全身。公功高位重，奸人侧目之秋，且天下一统，公独‘恨’太平何也？”公曰：“肖弟，一字之师也！”（《诗人玉屑》卷六）

“奸人侧目之秋”跟过去“四人帮”专横颇相类似。天下一统而张乖崖却“恨太平”，那一定要遭“无限上纲”，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。

第三则故事，讲的是五代僧人齐己。他有一首早梅诗，全文如下：

万木冻欲折，孤根暖独回。  
前村深雪里，昨夜数枝开。  
风递幽香去，禽窥素艳来。  
明年犹应律，先发映春台！

诗人郑谷读了这首诗后说：“数枝非早，不若一枝佳耳！”题目既然作《早梅》，看来郑谷的修改意见是正确的。这位僧人立刻下拜。人们遂以郑谷为齐己一字师。（见《五代诗话》及《中国春秋》）还有人以为“诗改一字，界判天人”，有如“光弼临军，旗帜不易，一号令之而百倍精采。”（分见《随园诗话》及《寒厅诗话》）

我们看到：所有一字师的故事，改诗者固然高明，而写诗者也都是当时文坛名流，难怪前人曾说：“作诗勿自满。若识者诋诃，则易之。虽盛唐名家亦有罅隙可议，所谓瑜不掩瑕是也。”（谢榛《四溟诗话》）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，确实就有这种可议之处，而且在文学史上已早被人指出。例如：

宋玉在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形容邻女美，是“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。”王若虚认为前两个太字应当删去。因为“增一分既已太长，则先固长矣；而减一分乃复太短，却是原短：岂不相室乎？”

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：“每出一令，平伐其功曰：‘以为非我莫为也。’”王若虚说这句话有语法上的错误，既用了“曰”，就不能再用“以为”。

李白《王昭君》：“一上玉关道，天涯去不归。”但昭君嫁北方匈奴，是不走玉门关的。（顾炎武《日知录·李

太白诗误》）

杜甫《哀江头》：“同攀随君侍君侧。”其中“同”字、“随”字、“侍”字意思叠出，虽然杨升庵曾为辩解，仍不足法。（汪师韩《诗学纂闻》）

苏轼《题阳关图》：“龙眠独识殷勤处，画出阳关意外声。”王若虚认为，动词“画”的宾语只能是“声外意”而不是“意外声”。

但是，这些都无害于名家的威望。所以，封建时代有人就如此说过：“拟诸圣人，其亦犹周公之过，孔子之不说于子路欤！”（汪师韩《诗学纂闻》）

## 奖掖后进

爱护培养青年，热心奖掖后进的人，历来受到人们的赞扬与崇敬。唐朝的杨敬之，可以算是鼓励青年写作的典型代表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二〇二“怜才”引《尚书故实》云：“杨敬之，爱才公正。尝知江表之士项斯，赠诗曰：

处处见诗诗总好，及观标格过于诗。

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相逢说项斯。

后来，“为人说项”竟变作成语。象杨敬之这样的人，历史上还是很多的。唐代的李白和白居易，以及宋代的王安石都曾得到前辈的汲引。

“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，名未甚振，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。知章览《蜀道难》一篇，扬眉谓之曰：‘公非人世之人，可不是太白星精耶！’”（《唐摭言》卷七）

“白乐天初举，名未振，以诗歌谒顾况。况诮之曰：‘长安百物贵，居大不易。’及读至《赋得原上草送友人》诗曰‘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’，况叹之曰：‘有句如此，居天下有甚难。老夫前言戏之耳。’”（同上）

“安石，临川人，好读书，善属文。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，修为之延誉。”（《宋史纪事本末》“王安石变法”）

一个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诗文，有无权威方面人士的推荐，诗文的命运往往大不相同。西晋大文学家左思，字太冲。他出身寒微，不好交游。《晋书》本传说，他花了十年功夫，写成《三都赋》，但却受到各方面的“讥訾”。左思的朋友张华为他出谋划策说：“君文未重于世，宜以示高名之士。”于是请了有声望的皇甫谧为《三都赋》写了一篇序。这样一来“先相非貳者莫不敛衽赞述焉”，甚至“豪富之家，竞相传写，洛阳为之纸贵。”

自己得到前辈汲引，后来成名了又转而诱劝后进的，韩愈最为突出。他幼年时曾被萧颖士的儿子萧存赏识；十九岁赴京考试，又得到古文家梁肃的称许；考取进士后，“故相郑余庆颇为延誉，由是知名于时。”（《旧唐书》卷

（下转第72页）

溃退”和“失败”（陈英昊《敦刻尔克大溃退及其历史教训》《辽宁大学学报》1978年第2期）。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未必确当，理由可归纳为以下几点：

第一，这次“大撤退”过程中虽曾出现过一些混乱现象，但整个“大撤退”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。这次“大撤退”的代号“发电机计划”是事先就拟好了的并为实现这个计划进行了相应的准备，而不是事到临头才匆匆应付的。正因为它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，联军才能在一个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的海港（敦刻尔克港）和暴露在德军鼻下的沙滩上，在短短的九天时间且战且退地撤出三十三万多人。这不仅是希特勒做梦也不会想到的，甚至就连英国人也认为是“奇迹”。这样的“大撤退”是不能称为“大溃退”的。

第二，这次“大撤退”虽然丢掉了全部的武器和装备（其中包括坦克六百辆、野炮和中型火炮一千门以上，反坦克炮五百门，高射炮八百五十门以及英国远征军十个师的全部车辆和装备），对于联军特别对于英军来说损失是巨大的，但联军撤出了三十三万多士兵，却使希特勒企图在佛兰德地区歼灭这支联军的目的没有实现。对此，邱吉尔曾说：“那些大炮、装备同军队比较起来又值几何呢？只要有他们，英国将来建立军队，就有了核心和基础。”（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，第二卷《最光辉的时刻》，伦敦1949年英文版，第67—68页）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英国有位军事史家对此事有这样的评论：“面对着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，在九天之内，三十多万

人终于安全的退回了英格兰，这一个事实使不列颠帝国的人民，为之精神一振。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。”（富勒《西洋军事史》，第三卷，军事译粹社1976年版，第62页）这样的“大撤退”是不能简单地看成“失败”的。

第三，这次“大撤退”过程中，虽然英国空军的损失是巨大的，但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戳穿了德国空军“无敌”的神话。法国和德国的军事史家都曾指出过这一点。法国军事史家亨利·米歇尔说：“在撤退的过程中，皇家空军的一百八十架飞机被击落。但是差强人意的是看到德国空军遭受的损失更大，而且它并未能阻止登船行动，这就为未来展示了希望。德国轰炸机很容易被英国战斗机击中，在混战中，英国战斗机也往往战胜德国战斗机。”（《第二次世界大战》上册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，第144页）德国战史专家也说：“德国最高军事领袖们对于空军的能力和效力都估计过高。于是其威力的限度第一次被暴露，而其‘无敌’的神话也化为乌有。”（德国军事研究协会主编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会战》，军事译粹社1976年版，第66页）

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大撤退完成之后，邱吉尔立即在议会把此事的全部经过向议员们报告。他说：“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。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。但是，在这次援救中却孕藏着胜利。”（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第二卷《最光辉的时刻》，伦敦1949年英文版，第103页）邱吉尔这一席话是很有远见并为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了的。

### （上接88页）

一六〇）这一番经历对韩愈的影响很大。所以中年以后，作为一个有威望的文学家，他一方面“观诸权门豪士，如仆隶焉，瞪然不顾”；另一方面却“颇能诱励后进，馆之者十六七。虽晨炊不给，怡然不介意。”（同上）“成就后进士，往往知名。经愈指授，皆称‘韩门弟子’。”（《新唐书》卷一七六）由于他热心引致后辈，所以当时，“多

有投书请益者。”（《唐国史补》卷下）

《唐摭言》还记载了一则韩愈赏识李贺的故事。李贺七岁时就能够写诗。韩愈、皇甫湜读到李贺的作品，起初不大相信，并且说：“若是古人，吾曾不知；若是今人，岂有不知之理？”于是亲到李家拜访，李贺当面赋《高轩过》，其后韩愈“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，由此声华籍甚。”

这些都成为千百年来文坛佳话。